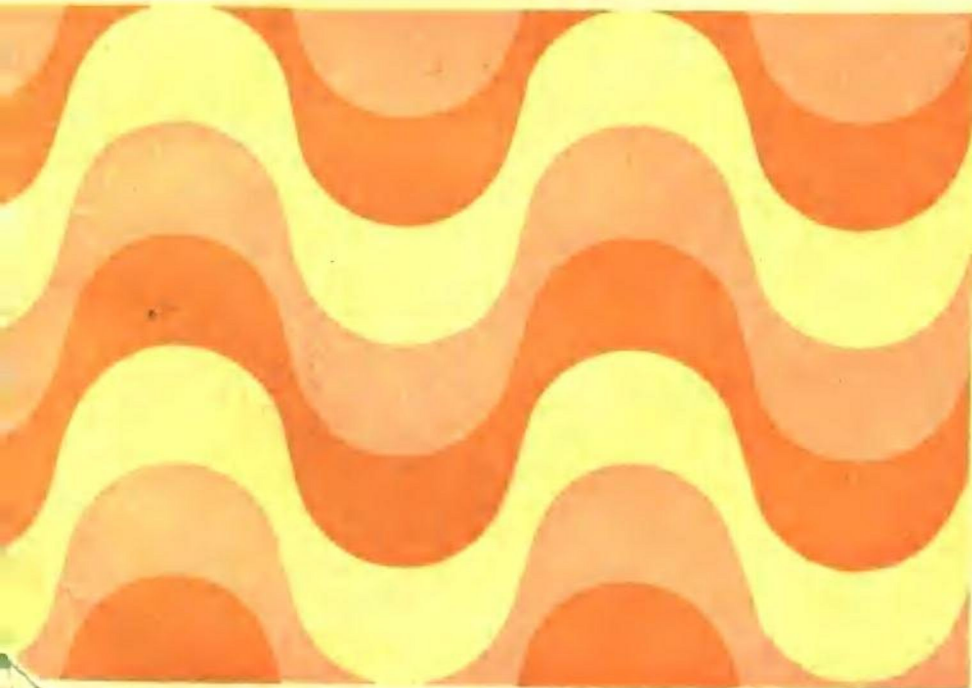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的 周期波动

刘树成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建国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已进行过多方面的、有益的探索。但是，长时期来，人们对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却一直讳莫如深。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已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一书，即是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进行较为系统地探讨的第一本专著。该书首先从实证角度出发，揭示了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一般特点。然后，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指导，着重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机制；计划决策和政治形势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最后，探讨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提出了有关的对策。

本书可供从事经济、政治、社会研究的理论工作者，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广大企业管理人员阅读。

责任编辑：郝 军

封面设计：王乃晋

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刘树成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京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6 12/32印张 150 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17-0357-4/F·305

定价：3.70元

前 言

关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在我国，尚属近几年来刚刚开始探讨的一个新课题。

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初，为纪念《经济研究》杂志创刊30周年，乌家培同志和我一起合写了《经济数量关系研究三十年》一文^①。在该文中，我们回顾了我国经济数量关系研究的历史，在展望今后的发展时，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新课题，其中就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当时是这样写的：“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问题的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有没有周期波动，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减缓以至下降的诸种因素之间此长彼消的具体数量制约关系怎样，建国3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起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决策正确或失误的影响，这种起落除决策是否正确的影响外还有哪些其他客观因素在起作用，其数量关系如何，在我们向2000年宏伟目标进军中怎样自觉地把握和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很多还都属于尚未问津的新问题。”

在此之前，1982至1983年，我曾参加张守一同志主持的“山西综合经济模型”的研制工作。在利用这一模型对山西到2000年经济的发展进行逐年预测时，开始，我们把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外生变量每年按一个百分比增长而予以赋值。但在实际计算中，我们发现，这样赋值存在一些问题。于是，我们将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一个上下起伏波动的外生变量予以处理。而当时，对于投资为什么会起

^①载《经济研究》1985年第6期。

伏波动，其内在制约关系怎样等问题，还都没有来得及去细心思索。到撰写《经济数量关系研究三十年》一文时，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新课题提了出来。

1985年下半年和1986年初，针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已连续几年膨胀，并已显露出1986年投资增长率将必然下降的趋势，我先后写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初探》和《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的再探讨——周期内各阶段的分析》两文，分别刊登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2、6期上。随后，经济学界又有一系列探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文章发表出来。^①

对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探讨情况，《经济学动态》杂志1987年第10期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②该文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一直讳莫如深。近年来，不少中青年学者大胆闯入这一禁区，尤其是继1984、1985年超高速增长后的生产滑坡，有关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的讨论骤然‘热’了起来。”该文还指出：“经济周期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问题已经提出，领域已经开拓，难点已经明朗。短短的几年，我国理论界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是令人鼓舞的”。

在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尝试从理论上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给予一个较为系统的说明。该书仍属探讨性著作，以期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并说明研究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重要意义。从第二章至第六章，将沿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展开。第二章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从实证角度说

^①参见本书末的文献二：《我国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报刊文章索引》。

^②杜辉：《近年来中国经济周期问题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1987年第10期。

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及其一般特点。第三、四章为本书的核心部分，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为指导，分三个层次，从理论上剖析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其中，第三章为第一个层次，说明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本身，即其内在机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内在的因果联系。第四章为第二、三个层次，说明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在其实现的过程中，计划决策、政治形势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作用；说明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的根本条件，即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第五章是根据第三、四章的分析，对我国30多年来的每一个经济周期进行综合的考察，进一步展开“为什么”的问题。第六章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提出解决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对策，特别说明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本书设有附录章，分别对匈牙利、苏联、民主德国的经济周期波动情况作一介绍。为便于研究起见，书末还列出了两种文献题录：文献一，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问题报刊文章索引；文献二，我国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报刊文章索引。

本书着重于经济理论上的分析，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数学模型问题暂不论及；关于解决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对策也只给予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而不详细展开。本书内未使用较为复杂的数学，以利于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得到刘国光、乌家培、马宾、李京文、张守一、周方、钟学义、沈利生、李长明、吴连生、郑开昭、姚愉芳、周德英、林颖、李晓光等同志的大力帮助（其中，林颖同志协助进行了附录章的编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致谢意！

作者

1988年4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重要意义	(5)
第二章 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一般特点	(10)
第一节 周期的划分标准	(10)
第二节 投资的周期波动及其一般特点	(14)
第三节 生产的周期波动及其一般特点	(24)
第四节 周期内的各个阶段	(34)
第三章 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机制	(39)
第一节 内在机制总论	(39)
第二节 高峰阶段的内在机制和经济特征	(45)
第三节 峰后持续增长阶段的内在机制和经济特征	(61)
第四节 低谷阶段的内在机制和经济特征	(72)
第五节 回升阶段的内在机制和经济特征	(80)
第六节 农业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89)
第四章 人为因素的影响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	(97)
第一节 计划决策的影响	(97)
第二节 政治形势的影响	(103)
第三节 社会主要矛盾根源	(105)
第四节 经济管理体制根源	(107)
第五章 各周期的历史分析	(110)
第一节 第一个周期 (1953—1957)	(110)
第二节 第二个周期 (1958—1962)	(114)

第三节	第三个周期 (1963—1968)	(117)
第四节	第四个周期 (1969—1972)	(120)
第五节	第五个周期 (1973—1976)	(122)
第六节	第六个周期 (1977—1981)	(123)
第七节	第七个周期 (1982—1986)	(129)
第六章	解决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对策	(129)
第一节	“治本”对策	(129)
第二节	“治标”对策	(133)
第三节	“利用”对策	(135)
附录章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	(144)
第一节	计划经济国家的投资周期	(145)
第二节	匈牙利	(156)
第三节	苏联	(166)
第四节	民主德国	(172)
文献一	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国民经济波浪 式发展问题报刊文章索引	(139)
文献二	我国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 报刊文章索引	(191)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我国经济建设上下起伏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翻开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人们会鲜明地看到，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人们也会鲜明地看到，这30多年的经济建设也是在不断的上下颠簸起伏中前进的。直至今日，如何克服经济的剧烈震荡，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仍然是宏观层次上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经常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微观层次上广大企业的经营决策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经济发展的不断起伏，产生出一系列的影响，这是人们所切身感受到的。经济发展的不断起伏，不仅影响到宏观领域各个方面的经济活动，诸如投资与生产的升降交替、财政与金融的松紧变换、管理上集权与分权的更迭等等，而且影响到微观领域广大企业的经济活动。比如，某企业要新建一项工程，此时极难获得批准，而转时则又可能较易上马；此时工程进展顺利，而彼时又可能被迫下马。再如，同一种产品（或某种机电设备、或某种钢材等），此时销售顺利，供不应求，而来时又会积压滞存。微观领域的

经营决策者，时常要紧紧盯住宏观“大气候”的“冷热”变化。

经济发展的不断起伏，不仅影响到经济领域本身，而且影响到社会政治、人民生活等更广泛的领域。比如，当经济处于困难和调整时期，党内外各种矛盾较易突出，人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如社会就业问题、城镇户口问题、大学生和研究生寻找较为满意的工作问题等）较难办理；而当经济处于好转和上升时期，社会政治局面就比较安定，人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就较易办理。

30多年来，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一直存在着的这种上下颠簸起伏，必然会引导人们思索：

1. 我国经济发展的上下起伏只是一种无规则的跳动呢，还是带有一定的周期性？

2. 若带有一定的周期性，那么，这种周期性只是计划决策的失误、政治运动的频繁等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呢，还是内中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在起作用？

3. 若只是计划决策等人为因素所造成的，那么，是否计划决策不失误就可以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呢？

4. 若内中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在起作用，那么，这个规律本身的内在机制如何？

5. 在这一规律实现的过程中，计划决策、政治形势等人为因素又起了何种影响作用？

6. 这一规律在我国发生作用的根本条件，即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7. 经济周期波动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周期波动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呢？

8.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为了克服经济的剧烈震荡，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我们又该取何对策呢？

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并应从理论上给

予系统的说明。但以往，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尚未展开过专门的探讨。

二、为何过去未曾探讨过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

这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其一，实践上的原因。我国经济学界曾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探讨过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问题。^①当时，有文章指出：

“波浪式前进，螺旋形上升，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并正确提出：“产生波浪式运动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人们的主观安排，而是前述各种客观经济因素的不均衡的变化的结果。但是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主观能动活动，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波浪式的变化幅度。”^②当时的探讨，总的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1. 一些文章具体分析了形成我国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各种客观经济因素，但不少文章是从哲学角度来说明事物发展的一般的波浪式运动规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内在机制问题。2. 当时的探讨是以总结我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那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尚短，经济的发展虽已呈现出上下起伏的波动，但其波动的周期性尚未充分显现出来，所以，还不可能提出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

其二，认识上的原因。过去，经济学界的传统认识是，经济的周期波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发展才有“春、夏、秋、冬”般地周期波动。而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资本主义那种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

^① 参见本书末的文献1：《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问题报刊文章索引》。

^② 刘国光：《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波浪式运动形式》（1961年稿），载刘国光著《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8页、110页。

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因此，不存在经济的周期波动。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永远象“春天”般地恒温发展。如果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则有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嫌。于是，这一问题无形中成了一个无人敢于问津的学术禁区。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经济的周期波动虽有相似的表象，但却有不同的性质、根源和前景。

其三，学科发展上的原因。对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过去，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偏重于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这就很难提出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来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研究已在我国开始兴起。但当时研究的重点主要是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平衡联系，即投入产出法。这是因为投入产出法与我国的经济理论、与我国计划工作中的平衡法，都比较接近。“十年动乱”期间，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遭受夭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在我国重新兴起，各种经济数学方法的研究陆续展开。但当时研究的重点主要是配合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进行长远规划的模型编制和预测、论证等工作。对经济长期增长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而忽略经济发展在中、短期内的波动。随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开展，但1984年底，出现了投资规模膨胀、消费基金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等问题；1985年，投资规模继续膨胀，生产增长过热；1986年，投资与生产的增长率又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由此，影响到改革中一些重大措施的顺利出台。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对经济中、短期波动问题的研究开始提上重要日程。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不断扩展，随着学术界的思想解放，随着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探讨。

第二节 研究经济周期波动问题 的重要意义

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既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涉及一系列重大的实际问题；既涉及经济发展问题，又涉及经济改革问题；既涉及经济领域的问题，又涉及社会政治等领域的问题；既涉及经济机制和经济行为的分析问题，又涉及经济数学模型的研制问题，等等。所以，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具有广泛的、重要的意义。

第一，对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意义。

建国以来，在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中，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方面的各种规律已进行过很多的探索。如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探索，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性质规律的探索，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探索，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探索，等等。与此同时，联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方面的各种规律，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也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对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比例的探索，对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探索，对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索，等等。这两方面的探索都有待于不断地深化，不断地开拓。但相比之下，前一方面的研究，其基础较为深厚；而后一方面的研究，其基础还很薄弱。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就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方面的一个新尝试。

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进行探索时，有很多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是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的。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亦是如此。马、恩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曾给予深刻的阐述。马克思也曾预见到，当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后，经济的发展仍然会有波动。^①但这种波动是否还具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6—527页。

有周期性，马、恩则都未加论述。马、恩为什么没有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呢？这需要我们细心思索。马、恩在论述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的发展时，往往是有一些重要的假设条件的。诸如：1. 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2. 生产力高度发达；3. 人们对经济活动能够实行有效的计划与控制。现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马、恩的上述第一个假设条件已被满足。但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特别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上述第二、三个假设条件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发展为何会呈现出周期波动，这就有待于我们从实际出发，去加以探索。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中，不断加深、丰富和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第二，对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意义。

所谓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波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是在一个有限的幅度内，合乎规律地进行周期波动并不断增长，即可视为经济的稳定发展。这种周期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内在的自我调节，它不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波动的幅度过大，震荡过于剧烈，则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破坏作用。30多年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之大，震荡之剧烈，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由此，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这与我国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反映在生产关系问题上和生产力问题上，有两个突出的、相对应的表现。一个是，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另一个是，认为生产增长的速度越快越好。前者违背了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后者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对于前者的错误，人们已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而对于后者的错误，对于经济发展中各种因果关系此长彼消的制约作用，还有待于从规律性的高度去加以

认识。为什么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是投资还是社会生产，都不能不加控制地无限增长？为什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所下的论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①，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欲速则不达”，愈速反而震荡愈烈，这其中的客观机制是值得我们去认识和把握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为了实现上述第二、三步宏伟目标，我们就必须很好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防止今后再出现大起大落的烈性震荡。只要我们不断地认识和把握经济的周期波动规律，我们就会在经济的周期波动面前，减少盲目性，增强驾驭能力。既不要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时期盲目乐观，失去控制；又不要在经济波动的低谷时期盲目悲观，手足无措。这样，才能把稳经济发展的大舵，有序地达到预定的目标。

第三，对顺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我们现在既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但二者是紧密相联、互为条件的。

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一方面，其内在逻辑的实现，不可能在经济的剧烈震荡中完成，它要求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另一方面，其内在逻辑的展开，不仅不能加剧经济的震荡，而且要为平抑经济的剧烈震荡服务，要有利于经济合乎规律地健康发展。

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一方面，其合乎规律地健康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4页。

展，不可能在原有的僵化的经济体制中进行，它有赖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成功；另一方面，只有其合乎规律地健康发展，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建设与改革形成了一种紧密连环的关系。怎样才能把握好这一连环关系呢？在这里，认识和把握经济的周期波动规律是很重要的。首先，要把经济的周期波动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幅度之内，严防出现经济的烈性震荡。其次，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为不同的改革措施提供了不同的出台时机。改革中各项措施的出台，既不能不顾时机，又不能错过时机。要善于在经济的适度波动中把握时机，及时推进改革，使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再次，不同的改革措施具有不同的经济影响。要利用不同措施的出台，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四，对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意义。

30多年来，我国经济形势的起伏是与政治形势的起伏紧相伴随的。后者对前者有着重大的影响；同时，前者又是后者的经济根源。每当经济形势好转和上升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容易形成和巩固；而当经济形势困难和下降时，党内外各种矛盾容易突出，社会上容易闹事。比如，1956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比较紧张，加之其他因素，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和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还有少数农民闹社的事件；^①1958年的“大跃进”，使1959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开始紧张，党内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

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全党日程。为了顺利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而且需要有一个长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有利于我们及时把握社会政治形势所可能发生的变化，以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

^① 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五，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的意义。

在我国，编制与应用经济数学模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不能作为建立经济数学模型的直接的理论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运用抽象法揭示经济过程最本质的联系的理论。事物最本质的联系具有单一性。而经济数学模型要反映现实的经济机制的运行和经济行为的变化。现实的经济活动具有丰富多样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数学模型之间，还应该有一座沟通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和经济行为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加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和经济行为的研究。

过去，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偏重于引进，二是偏重于直接应用。数量经济学在我国建立和发展时，国外同类学科已有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历史，我们必然要有一个向国外学习和从国外引进的过程。同时，数量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一些经济数学方法从国外引进后，直接转向了应用领域。这样，对于建立经济数学模型所需要的关于我国经济机制和经济行为的理论，则缺乏深入的研究。由此所编制出的经济数学模型，必然难于反映我国国情，难于具有中国特色。

关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来说，可以使我们摸索出一条新路子。这条新路子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机制和经济行为理论为直接基础——建立能够反映我国国情的经济数学模型。

第二章

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一般特点

本章将要回答的问题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上下起伏只是一种无规则的跳动，还是带有一定的周期性。我们首先说明经济周期的划分标准问题；然后，从实证角度，以实际统计数据为基础，考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社会生产的周期波动情况及其一般特点；最后，分析周期内的各个阶段。

第一节 周期的划分标准

一、马、恩关于周期长度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波动的周期长度问题，曾有过不同的论述。马克思一直把当时的周期的平均长度计为10年，而恩格斯则分别计为5年和10年。

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表现为“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①他具体考察了从1815到1863年这49年间英国棉纺织业的波动，把它划分为5个周期：①1815—1825年，历时11年；②1826—1838年，历时13年；③1839—1847年，历时9年；④1848—1857年，历时10年；⑤1858—1863年，历时6年。^②每个周期的平均长度约10年。马克思在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8—499页。